

# 行为体“身份”与对外政策： 美台关系的建构主义分析

信强 倪世雄

**【内容提要】** 秉承理念主义思维逻辑的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基于政权组织形式差异而形成的国家“身份”意识对于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重大影响。文章借用建构主义的分析视角,通过分析中国台湾对美开展“身份外交”的政策行为以及美国对美台“身份”认同的发展演变,对美台关系中“身份”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进行阐释。

**【关键词】** 国家身份;身份外交;美台关系

**【作者简介】** 信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助理研究员,985工程二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创新基地成员;倪世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9550(2006)01 - 0022 - 07

台湾问题无疑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和重要的议题,自1949年蒋介石集团逃台至今,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美国及台湾地区三者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美蒋结盟、中美建交、台湾实现“民主化”、第三次台海危机等一系列波折和变化,但是美台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却始终保持了相当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究其原因,我们不仅应该看到其中所包含的传统地缘政治和安全战略的考量,也应该看到双方在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层面上存在的共识和“身份”意识对美台关系的影响。事实上,如果仅仅遵循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逻辑,我们将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在迫于苏联的战略压力而谋求缓和中美关系之际,依然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坚持对台售武;也很难理解为什么在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不久,美国国会便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也很难理解为什么明知将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克林顿政府依然会允许李登辉赴美“访问”。如此种种,均显示出传统的现实主义解释框架所存在的不足和缺失,促使我们思考是否存在着其他一些重要的解释变量和影响因素。作为一种尝试,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依循建构主义理论的分析路径,对美台关系中的“(行为体)身份”因素及其影响进行诠释和阐释。

## 一 重视“身份”： 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

秉承理念主义思维逻辑的建构主义反对纯粹的物质主义,认为“观念的作用像物质力量一样,是客观的、具有制约作用的、真实的”。“物质资源只有通过嵌入其中的共同知识的结构,才对人类的行动具有意义。”因此,建构主义试图以“态度、期望、知识、信念”等作为基本要素来解释国家行为,通过将理念变量提升为能解释社会行为的基本变量,以此来考察现象和原因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进而寻找国际现象和国家行为背后的心理

当然,笔者在此并不是要否认现实主义分析框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而是希望从一个新的角度对美国对台决策和美台关系的发展进行分析和解读。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Summer 1995, p. 73

理和文化动因。

“身份 (identity) 是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身份意识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理解 (self-understanding)”,“指的是行为体是谁或者是什么这样的内容”。在建构主义理论看来,国家是具有各种各样特定“身份”的行为体,其自有身份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其中外在结构是指国家置身其中的一种国际间的政治文化环境,而内在结构则同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亦即国家“政权类型 (regime types) 或“国家形式 (forms of state) 相关联。在国际社会中,具有不同国内政治属性的行为体建构起了不同的“自有身份”,而国内属性彼此相似的各个独立国家则会将自己塑造为“一个群体或‘群我的一部分’的意识,建构起相似的“集体身份 (collective identity)”,或是某种“共同的‘自群体身份 (in-group identity)’,借以“重新界定自我和他者的界限”,并以此为基础塑造身份认同和共享知识 (shared knowledge),进而影响甚至决定着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国家依据其自有身份与其他行为体互动,从而建构起一种“认同同心圆”。在这个同心圆的内圈是那些与该行为体在身份上具有更多相似性的行为体,然后依次递减。自有身份相类似的行为体通过彼此之间的“认同 (identification) 过程,使自我-他者的界限模糊,从而建构起“集体身份”,而一旦“集体身份”得以建构成功,则将使“行为体把他者的利益界定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亦即具有‘利他性’”。

作为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国家无疑具有各异的文化哲学背景、思想意识、观念和价值体系,并根据这些“主观事实”形成对世界以及其他国家的偏好和认知,建构起“自我身份”和“集体身份”,并界定“他者”,然后部分地以此为依据来指导自己的政策行为,从而使国际关系带有浓重的价值伦理和意识形态色彩。也正因为此,建构主义学者均十分重视国家的内部性质,认为这是影响国家行为体间互动以及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例如迈克尔·巴奈特 (Michael Barnett) 在论述国家有可能摆脱安全困境而建立起“安全共同体”时便指出:“这种(安全)共同体由主权国家组成,成员国间拥有共同制度、共同价值观、共同的共同体感。”温特也指出,如果英国和朝鲜同样拥有了核武器这一物质性的客观实在,但是美国只会把朝鲜当做其安全的威胁,并对它们采取截然不同的对策和行为。国家自有知识可以成为国家判断国际形势和界定国家利益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研究一

国外交决策时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如以中美关系为例,由于中美两国具有迥异的历史发展历程、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由此导致两国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自有知识和自有身份。而反观美台关系,则由于台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了与美国类似的政治、经济制度,共享某些政治文化和价值理念,从而在美台之间形成了某种“集体身份”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美台关系数十年来虽然历经波折和变化,却始终具有相当显著的连续性,并得以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框架之内。为此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借用建构主义理论的分析视角,针对“身份”意识和行为体认同对美台关系的发展和演变所具有的影响展开进一步的分析。<sup>⑩</sup>

## 二 塑造“身份”： 台湾对美的“身份外交”

冷战伊始,深谙美国国内政治运作规则尤其是民众与政府高层内心深处理想主义情结的台湾当局便十分注重对美开展“身份外交”的工作,强化美台之间的“身份”认同,希望能够借此获取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支

[美] 昂昂·费斯汀格著,郑全全译:《认知失调理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在英文中,“identity”一词具有多重含义,尽管在多数情况下应译为“身份”,但有时也可译做“认同”。对“identity”一词的含义及具体翻译用法,可参见刘丰、张睿壮:《关于几个重要国际关系术语中文译法的讨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0期,第69~70页。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9页。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2页。

Robert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例如亚历山大·温特便认为,建构“集体身份”共有4个主要变量,其中之一就是国家在内部政权组织形式上的“同质性 (homogenization)”。具体可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23~425页。另可参见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litics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6, No 2, 1992, pp. 397 - 402.

John Turner, et al., *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 A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Christopher Jencks, “Varieties of Altruism,” in J. Mansbridge, ed., *Beyond Self-Inter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p. 53 - 67. 转引自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8页。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6 - 7.

<sup>⑩</sup> “身份”概念适用于各种类型的行为实体,而不仅仅是适用于国家。例如本文中所述的台湾就并非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依然可以运用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进行分析论述。

持,以便对抗祖国大陆的统一进程。台湾当局对美“身份外交”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蒋介石集团逃台之后直至台湾实现“民主化”转型。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土崩瓦解,美国政府开始考虑从中国“脱身”。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声称美国无意在台湾地区“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也“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标志着美国“弃台政策”的正式确立。为了逃脱彻底败亡的命运,蒋介石政权在强调台湾在美亚太和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的同时,开始对外交工作进行调整,积极对美展开“身份外交”。在这一阶段,台湾当局“身份外交”所强调的是其与美国在“反共”意识形态方面的同一性,通过攻击祖国大陆是“赤色中国”,而将台湾地区塑造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坚强堡垒,强调美台之间所共享的“反共”意识形态,争取美国的对台援助,以期以台湾地区为“反共”基地,伺机“光复大陆”。

为此,国民党当局借助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国内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狂潮,通过以“百万人委员会”为骨干的“院外援华集团”对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施加压力,在美国成功地营造出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华(大陆)”、“反共”的政治情绪和氛围,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美国如果有人敢为新中国说话,批评台湾当局,就会被冠以“绥靖”、“投降主义”甚至不爱国的帽子。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通”纷纷遭到清洗,大多数学者和官员在讨论对华政策时不得不赞成反共观点和亲台政策。例如在1952年总统大选时,艾森豪威尔便强烈抨击民主党对“共产党政府”“软弱”,而称赞国民党“政府”“是亚洲一个毫无疑问的反共政府”,是“美国坚定的朋友”。1954年12月,美蒋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其目的就是利用“自由中国”——台湾——来封锁和遏制“共产主义中国”。用杜勒斯的解释就是该条约“为保护西太平洋地区已自由的人民防御共产主义侵略提供了基本的组织结构”,以便在“太平洋上构筑起一道反对共产主义的围墙”。1960年6月,美台发表联合公报,宣称由于“注意到共产党接连不断地威胁要入侵自由世界,尤其是远东自由国家”,因此美台“一致同意自由国家之间加强团结,增强实力是极其必要的”,惟其如此,才能“对付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提出的挑战”。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台湾当局竭力赋予美台以共同的集体身份,即两者都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自由国

家”,“反共”成为两者身份认同的基础。为此,尽管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一度斥责国民党当局是“腐败”、“无能”的独裁政权,但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却转而将“台湾岛上的中华民国”标榜为“自由堡垒”,是“世界上一切爱好自由的华人的基地”,并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而退守台湾一隅的国民党“政府”则为了获取美国的支持,竭力渲染所谓的“共产党统治的大陆”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并将自己塑造成为“自由世界”的一员,是对抗“赤色中国”的前沿阵地,是肩负着“抵御共产主义扩张的重大使命的盟友”。对于美国在冷战期间亚太安全战略的确定,台湾当局展开的“身份外交”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从而促使美国历届政府将“努力使台湾保持自由,不使其落入共产党控制之下”确立为远东战略的重要目标,也使“台湾从一个使华盛顿厌烦待弃的包袱,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反共阵营中的重要一环”。

然而随着世界局势的转变,中美开始抛开意识形态上的歧见走向缓和,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中美关系稳步发展,而中国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发展战略则使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认识出现改观,许多坚决反共反华的美国政要均开始与台湾当局拉开距离,“反共意识”逐渐淡化,美台之间多年来建立在“反共”基础上的身份认同开始逐渐面临销蚀。

在这一阶段中,随着美台“断交”,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和其他一系列重要的国际组织,台湾当局深刻感受到“国际人格”的“萎缩”。为了摆脱政治孤立,重获国际支持,同时也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台湾当局开始将推进“民主政治”作为谋求美国乃至西方国家同情和支持的重要砝码。为此,在蒋经国领导下的国民党开始取消戒严令,解除党禁报禁,推进台湾政权的本土化,吸引台籍精英进入“政府”高层。在李登辉升任“总统”之后

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

转引自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页。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240页。

Tsou Tang,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 - 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p. 329 - 330

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第321页。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第188页。

郝雨凡:《美国对华政策内幕》,北京: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则通过6次“修宪”等措施进一步推动“民主化”进程。在政治领域,台湾当局依循美国政治理念,效仿美国的政治体制,积极推动所谓的“宪政改革”。无论是“五权宪法”,抑或是声称实行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权能区分”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均权制度”,无不体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影响。李登辉时期通过废除“万年国代”,确立了与美国十分相似的“三权分立”政治架构;取消了“终身总统”,于1996年3月23日举行了首次“总统直选”,李登辉则被某些美国媒体冠之以“民主先生”的称号,台湾当局也被鼓吹为“由独裁转为民主政治的典范”。民进党的兴起以及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的获胜则标志着台湾当局第一次实现了和平的“政党轮替”,以多元化为主要特征的“政党政治”得以确立。

在实现了上述“民主政治”转型之后,台湾当局对美“身份外交”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尽管台湾当局依然时刻不忘渲染祖国大陆的“共产主义国家”性质,但其对美“外交攻势”所强调的着重点开始逐渐转向宣扬“民主化”的台湾是华人世界第一个实现了直接选举的“民主国家”,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社会多元化、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是亚洲“美国式民主制”的“达标国家”,竭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由民主台湾”的国际形象,试图在美国朝野形成一种基于“民主国家”身份之上的认同观念,重获美国乃至国际社会的认同。而与此同时,攻击祖国大陆是“独裁专制”的共产主义国家,是对“民主台湾”以至所有民主国家的威胁等等,试图以此影响和加强美国对台的“民主国家”身份认同,以博取美国的同情和支持,对抗祖国大陆的统一要求。1995年6月9日,李登辉宣称:“台湾已在和平的过程中,转化为民主政治,同时也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并在亚太地区的国际社会,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影响力。”2000年1月20日,李登辉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年会上声称台湾当局以“宁静革命”实现了从威权到自由民主的转型,并时刻不忘提醒美国“中华民国和美国的政治理念是一致的,且主要的价值观如崇尚民主、自由、正义和平等,都是与我们一致的”。

2000年5月20日,陈水扁在“就职演说”中也一再强调“民主”的作用,声称台湾当局“用民主的选票完成了历史性的政党轮替”,这“不仅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更是全球华人社会划时代的里程碑。台湾不仅为亚洲的民主经验树立了新典范,也为全世界第三波的民

主潮流增添了一个感人的例证”,实现了“民主的政治奇迹”的台湾已经成为“民主之岛”等等。在其短短的一篇“就职演说”中,仅“民主”一词就出现了31次之多。

在陈水扁“就职”之后不久,台湾新任“外交部长”田弘茂便提出了台湾当局的“外交政策新方针”,并明确指出,财经力量及成熟的民主制度是台湾当局推动“外交工作”的两张王牌,并将积极实施所谓的“三民”政策,而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宣扬民主成效”。为此,台湾当局将要推动“民主外交”,并将之作为“外交政策”重点,以建立台湾良好的“外交形象”为目标,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民主、自由、繁荣的中华民国参与国际社会”。

2004年3月,陈水扁在一片争议声中实现“连任”,为了平息美国对陈水扁当局的不满和疑虑,获取美国的支持,陈水扁再次打出“民主牌”,多次宣称台湾当局与美国的友谊基础不仅在于维护共同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建立在自由、民主、人权与和平之上的“价值同盟关系”。同年11月10日,陈水扁又抛出了所谓的“十项裁示”,其中第一条便是“感谢”美国的长期支持,并鼓吹“未来双方应在价值同盟与既有的基础上,继续积极合作以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试图以此来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民主台湾”的“身份”认同。

台湾当局通过塑造美台认同,树立起“谁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观念,将祖国大陆塑造为一个有别于双方的“异类”,从而唤起美国对台湾当局的同情,并体现在相应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由于具有相同的政治理念、制度和价值观,因此在美台互动中,双方均将对对方的角色身份界定为“朋友”,而祖国大陆则被界定为“敌人”或“非敌非友”,是对双方共同的威胁,因此美台应该携手合作。我们套用亚历山大·温特的

“Managing the Taiwan Issue: Key Is Better Relations with China,” *Report of an Independent Task Force*,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5, p. 11.

陈锋、林宏:《中美交锋大纪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8页。

新华社香港2000年1月16日电,另可参见《“李总统”泉影演说不触及两国论》,载《联合报》,2000年1月16日第4版。

<http://twri.xmu.edu.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37>

所谓“三民”,指宣扬“民主”成效,扩大“民间”参与国际社会,广征“民意”对于外交政策的看法。

<http://twri.xmu.edu.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21>

分析模式,即祖国大陆与美台之间的观念结构是“霍布斯文化”,美台之间则是“康德文化”。而“国家对待敌人的行动与它对待朋友的行动是不一样的,因为敌人是一种威胁,朋友则不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基于身份认同而导致的国家政策行为则会促使对方采取相应的对策,并产生一种“上升型”或“下降型”的螺旋效应,强化原有的认知,从而使这种认知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 三 美对台决策中的 “身份认同”动因

美国是一个兼具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的国家。美国自开国伊始,便自视为“山巅之城”,是一个“以民主、自由和社会正义为光辉榜样而屹立于旧世界之前的新世界”。因此,“一种本质源自于基督教信仰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的美国理想主义所体现的美国价值观念、道德准则、美国使命及国家目标始终是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要因素”。美国国家“自有身份”认同的构成可以分为多个层面的内容,简而言之,就是以民主制和分权制衡的宪政体制为核心的政治认同;以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经济认同;以尊重公民权利、崇尚自由、多元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认同;以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念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认同。自由、民主、公民权利、三权分立、市场经济和以宪政体制为基础的法治观念都是美国社会一致接受且不可挑战的信条,由此塑造了美国的国家身份以及对他的心理认同或拒斥,并最终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之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

自步入国际政治舞台以来,美国外交始终带有鲜明的“价值化”色彩。无论是冷战初期的“反对共产主义”、保护“自由世界”的主张,抑或是卡特时期“人权外交”的实行以及冷战后促进“民主制度”的推展,无不反映了这一特征。而且美利坚民族在思维上的二元论色彩,又使其很容易将世间万物分为截然对立的两个极端,即“非黑即白”的二分法。体现在国际政治领域,美国对于与其价值观不符的国家很难形成认同,并与其平等相处,而是往往将其视为“另类”,甚至是敌手,必欲除之而后快,或是竭尽所能地促使其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发生转变;而对于与自身享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则视为朋友,甚至有时以牺牲现实利益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冷战

结束后,美国人对自身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的信心急剧膨胀,认为“美国获胜不是靠其军事力量和外交技巧,而是靠着美国制度基于之上的民主思想的力量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失败”,甚至认为是“民主制赢得了冷战这场伟大的意识形态斗争”。1990年9月11日,老布什提出了构建“世界新秩序”的美国全球战略构想,期望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起一个“政治和经济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盛行”的国际体系。克林顿政府则将“扩展市场经济、美国的价值观与世界自由民主力量”定义为其“参与和扩展战略”的主要内容,并将推行“民主、人权”提高至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与繁荣的高度,成为美国推行现实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柱和外交战略的长远目标。例如1993年9月21日,克林顿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在其“从遏制到扩展”的演说中便明确地反映出了美国以“国家类型”或者说“国家身份”划线,以“是否是民主和市场经济国家”为标准来确定对外政策的理念和特征。声称美国将针对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其重点就是要发展和巩固同已经实现了市场制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而对于那些“对市场制民主国家持敌对态度的国家”则采取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孤立政策。

与台湾对美“身份外交”相呼应,美国对美台“集体身份”的认同也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一是在冷战期间。当时“共产主义中国”被视为是对美国在远东利益的严重威胁,为了对抗中苏同盟,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美国与坚决反共的国民党政权结成了同盟,通过巨额军援和经援,使台湾地区成为美国在亚洲反共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其防御体系中遏制“红色中国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litics Power," p. 397.

[美] J. 斯帕尼尔著,段若石等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27页。

王公龙:《理想主义与美国的对台政策》,载《当代亚太》,2000年第10期,第22页。

转引自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页。

Lary Diamond, "Promoting Democracy," in Eugene R. Wittkopf, Christopher M. Jones, eds., *The Fu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 101.

Anthony Lake, "From Containment to Enlargement," address at th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Washington, D. 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Vol. 4, No. 39, September 27, 1993, pp. 658 - 662.

在亚洲扩散共产主义的主力。源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此后数十年,美国历届政府都将扶持台湾当局作为对华政策的轴心。基于“反共”认同之上的美台关系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在冷战期间,美国将蒋介石集团统治的台湾诳称为“自由中国”,但是由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即便美国自己也深知这只是在自欺欺人而已,因此当时美台之间的认同基础除了二战期间建立的“传统友谊”之外,更主要的是基于共同的“反共”意识形态。因此,自1949年之后的短短几年间,美国对台政策经历了从“弃台”到“保台”的重大转变。从1950年1月杜鲁门的声明和艾奇逊的“美国西太平洋防线不包括台湾”的政策宣示,到1953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6号文件宣称美国远东防御政策中的一个基点就是“保证台湾的安全及不使其落入共产党手中”以及1955年1月25日和28日美国参众两院分别以409票对3票和85票对3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福摩萨决议案”,授权总统在必要时使用武装部队防御和保卫台湾不受武装攻击,均可以看出冷战初期美国对台政策的主轴就是围绕着“反共”这一核心价值理念展开并制定的。尽管为了共同抗衡苏联的全球扩张,中美之间在尼克松访华之后出现了一段短暂的“蜜月”期,但是美国利用台湾地区制约“共产主义”中国的战略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二是冷战后时期。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在美国全球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大幅度下降,加之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成为美国部分政客以及民众心目中“拒绝教化”的“异类”。而此时,与祖国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地区却“顺应时代潮流”,实现了“民主化”,台湾当局推行的一系列“宪政改革”措施得到了美国媒体舆论几乎一边倒的“赞扬之声”。这使美国公众对海峡两岸政局的发展形成了一种反差强烈的认知。自此,美国对台湾地区的认同在传统的“反共”情结之外又加入了“民主国家”身份认同的成分。强大的舆论和民意压力促使美国政府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而保护“民主化”了的“老朋友”台湾地区则几乎成为美国朝野的共同信念。美国不仅将台湾地区视为“美国式民主”在亚洲的胜利,而且希望以其作为样本,使之成为美国在亚洲以至全球推动“民主”外交攻势的榜样和杠杆。台湾地区民主化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美国外交理念的成败,也直接关系到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民主、人权”战

略的前途。因此,保护“民主台湾”不仅成为美国府会政要的共识,也成为美国民众对台湾地区最朴素的认同之上所派生出的自然反应。捍卫美国的价值观、在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亚太地区推进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美国维持和发展美台关系的重要动因。例如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台湾地区已经实现了“民主化”,因此美国“应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台湾地区。1996年3月19日,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案,声称美国应保持与“台湾民主政府”的友好关系及对它的承诺,“帮助它(台湾)抵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导弹进攻或封锁”。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结束之后,美国总统和国会便纷纷发表声明,对陈水扁的当选表示“祝贺”,克林顿在贺电中“称赞”此次台湾地区选举表明了民主的力量和生命力。在2004年台湾地区“总统大选”中,尽管陈水扁不顾美国的反对,强行以“公投绑大选”,加之三一九枪击案疑云重重,但是美国仍然派出了以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资深议员吉姆·利奇为首的“庆贺团”,参加陈水扁的“就职典礼”,以“肯定”台湾地区的“民主成就”。如此种种,均体现了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民主国家”身份的认同,并不可避免地对美国对台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 四 “身份认同” 对美台关系的影响

以民主和人权为核心的美国价值观使美国民众对所谓的“极权”共产主义国家有着一种本能的恐惧和厌恶。冷战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在美国国内催生了一种中世纪猎巫式的反共行动——麦卡锡主义,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例如基辛格就将美国的特殊角色看做是“反对两个侵略成性的极权主义双胞胎的‘各民族的自由堡垒’与‘人类希望的寄托’”,看做是受到共产主义威胁、受传统观念束缚的第三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代理人,看做是对红了眼的、狂傲的革命党的一个克星”。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朝鲜、越南革命政权无疑是对美国国家利益和核心价值观的一

梅孜主编:《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第333页。

刘连第:《中美关系的轨迹》,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631~632页。

[美]迈克尔·亨特著,褚律元译:《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种威胁,美国必须进行干涉,甚至在必要时不惜动用美国军队直接干涉。正如福斯特·杜勒斯所指出的,冷战期间,“美国国内压倒一切的反共情绪不允许有任何后退,美国必须支持国民党”。而台湾地区的“(反共)身份”外交攻势则为此推波助澜,使美国对海峡两岸关系形成了扭曲的认知,认为中国的统一诉求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企图消灭一个“自由国家”的阴谋,从而使“决不能把他们(台湾人民)推入中国共产党的怀抱”成为多年来美国远东安全战略不可动摇的基点。

而在台湾地区实现“民主转型”之后,美国国内“捍卫台湾民主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并且成为凝聚美国朝野共识的基础之一。与此同时,台湾地区也逐步调整“身份外交”的着力点,美台开始逐步形成新的建立于“民主制度”和“自由社会”理念之上的认同基础。美国的媒体,无论是自由主义色彩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还是保守主义的《华盛顿时报》,在提及海峡两岸问题时都习惯于将中国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或是沿袭冷战初期时的“红色中国”的称谓,而在谈到台湾地区时也时刻不忘提醒美国公众那是一个“民主化”的“国家”,但却被中国视为“叛离的一个省”,时刻面临着中国的武力威胁。无论是国会法案、决议案抑或是行政部门的政策声明,也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会特意提及台湾地区的“民主国家”特性。这些都使美国民众产生了错误的认知,即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地区安全的“独裁专制”国家,而这又与美国政府、媒体多年来所宣扬的中国的“身份”相符,并不断得到强化,形成一种“下降的螺旋”。1995年李登辉访美之所以能够成行,尽管其中不乏台湾当局的幕后运作以及亲台利益集团的推动,但是美国民众、媒体以及国会两院之所以如此坚决地支持邀请李登辉访美,很大程度上就是将之视为是对李登辉和台湾地区“民主化进程”的一种“道义”上的支持。而随后在台湾地区“总统大选”期间,祖国大陆在福建沿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克林顿以保护“民主”的名义,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在台湾海峡巡弋,直接引发第三次台海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台湾地区“民主认同”外交导致的后果。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小布什指责中国在福建沿海部署导弹是“共产主义中国”对台湾地区“民主制度”的威胁,因而也是对美国全球利益的“危害”,美国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台湾地区。尽管这种政策宣示带有“选举语言”的色彩,但是小布什之所以如此,也正是因为摸准了美国民众的心理,以此来拉取选票,从

一个侧面来看也正反映出了美国认同“民主台湾”的情结。对此,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奥克森伯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地区在美国的保护、支持和扶持下,逐渐取得了经济上的繁荣和政治上的民主,美国人对此深感骄傲和自豪,作为美台关系密切的结果,美国对台湾人民有着一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感。

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美国利用台湾当局来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到90年代开始从军事和政治上鼓励和维持台湾地区“民主制度”,并发挥“民主台湾”的“榜样”作用,以牵制中国并伺机促使中国出现转型,我们可以看出美台“集体身份”认同也相应发生了转变,即由一开始的“反共”盟友转变为“民主”伙伴,其认同基础也从冷战时期的“反共”意识形态,转变为冷战后对彼此同为“民主国家”的认同。

近年来,“考克斯报告”、“中国间谍案”以及“中国威胁论”均曾在美国被炒作得沸沸扬扬,而与之相对,美国对日本、以色列以及台湾地区却不断出售最尖端的武器和技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反映出美国基于“集体身份”意识而形成的“认同”差异。对美国而言,中国被视为“敌人”,或者至少是“竞争对手”;而台湾地区对于美国来说则是盟友,或者至少是朋友,因此无须过分担心其会对美国构成战略上和安全上的威胁。如果仅仅从现实主义的视角来考察,我们显然无法对这种现象做出全面的解释,而必须从建构主义的角度,从国家“身份”认同的角度来加以诠释,才能得出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解答。诚如温特所言,虽然物质条件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真正“单凭物质条件能做的解释却是很少的”。

[收稿日期:2005-01-06]

[修回日期:2005-05-09]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Foster Rhea Dulle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1949 - 1969*,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1972, pp. 150 - 165.

[美]吉姆·赫尔姆斯、詹姆斯·普里斯特主编,张林宏等译:《外交与威慑:美国对华战略》,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郝雨凡、张燕冬:《无形的手——与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点评中美关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页。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99页。

## Abstracts

### Exploring the Dynamics of Ideas on China

Wang Yizhou (1)

### Zhoubian Institutions and Zhoubianism: China's Approach to Governance in East Asia

Su Changhe (7)

With the increas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open-door policy since 1979, China's relationship to the world has gradually been transforming from an independence model to an interdependence model. In the interdependence model, regional public issues are becoming important on the agenda for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In the process of cooperative efforts by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to address regional public issues, many formal and informal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this paper, these institutions are called zhoubian (peripheral) institutions.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reflect not only the idea of a grand zhoubianism in recent China's diplomacy, but also the practice of China's new diplomacy that shows more responsibility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interdependence.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zhoubian institutions initiated jointly by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are playing an ever more important role in East Asian regional governance.

### A Review of Critical Geopolitics

Xu Qinhua (15)

No other field gives rise to as many geopolitical arguments as the field of political geography. From traditional geopolitics to new geopolitics, the field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prosperity, downfall, and revival. Today, with globalization advancing and traditional geopolitical factors becoming less importan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ome geopolitical scholars have begun to reconsider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national centralism and social Darwinism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creating a new branch of critical geopolitics. They focus on issues such as global interdependence, reg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economic fact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mphasizing the changing aspects of R.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by reinterpreting traditional theories critically, the new geopolitics has broadened people's thinking and has provided a new impet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geopolitics.

### 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Making: A Constructive Perspective on U.S. - Taiwan Relations

Xin Qiang Ni Shixiong (22)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vism, identity consciousness among states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upon policy making.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try to explore the "identity diplomacy" of Taiwan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 identity identification " on the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 Taiwan, so as to examine and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of identity in U. S. - Taiwan relations

### **Power, Institution, and Identity: An Analysis of U. S. Policy toward the ARF**

**Chen Yiping** (29)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a regional security framework in which all major powers participate, has played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Asia - Pacific region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ccording to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HST), a hegemonic power may create or support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so as to maintain its primacy by offering the followers collective goods, such as free trade, stabl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or security, and by paying all the costs. But the HST does not answer why the United States, a hegemonic power, adopted different policies toward the ARF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On this question, realists, neo - liberal institutionalists, and constructivists have provided different answers. By comparing the advantages and weaknesses of the three approach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power, institution, and identity are the three significant variables that resulted in the change of U. S. policy toward the ARF.

### **The Problem of Terrorism: A Multi - dimensional Perspective**

**Hu Weixiong** (36)

Different nations and societies may have different value judgment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errorism. Up to now, there has not been a unified definition of terrorism. Since the right to discourse on terrorism has been monopolized by nations that are in the main bo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errorist behavior such as war and autocracy are often ignored. In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questions such as what kind of " terrorism " should be combated, what means should be adopted, and how terrorism should be combated are all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ests of the nations involved. Most importantly, there have been major differences among nations about how to deal with the " war on terrorism. " The author argues that simply depending on military resolutions, such as the monster of war in which people slaughter one another, will hardly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eliminating terrorism. Finally,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up to now, no effective way has been found to solve the issue of terrorism - a puzzle of the century.

### **Environmental Security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The Feminist Critique and Its Prospects**

**Guo Xijuan** (41)

After the 1980s, R scholars began to be concerned about the issue of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over time their understanding gradually became more and more comprehensive. Against this backdrop, feminist scholars analyzed traditional security concepts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theories and practices, revealing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lack of gender therein and revealing the root of the dualism embedded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by analyzing gender issues in traditional security fields, feminists have put forward their own plan for environmental security from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that presents an ideal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security.

### **Building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Lines By passing the Hormuz Strait: Strategy for Safe Oil and Gas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Gulf Region**

**Wang Hai** (48)